

福建党史资料

第二辑

(689)

北方工业大学社科部 资料室	
总号	11662
分类号	
1987年9月1日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福建党史资料

第二辑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编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七月

目 录

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邓子恢 (1)
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顾·····	罗 明 (45)
三年游击战争·····	方 方 (82)
红三团的武装斗争·····	尹林平 (151)
战斗在敌人后方·····	魏金水 (161)
抗日战争时期的片断回忆·····	梁国斌 (177)
闽粤赣边区人民革命武装斗争回忆·····	刘永生 (206)
闽北革命斗争的回忆·····	左丰美 (226)

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邓子恢

一、大革命以前龙岩的政治经济概况 和革命活动情形

龙岩县位于闽西山僻地区，田少人多，粮食常年仅够自给，荒年要靠洋米进口，其他土产如烟、纸、茶、竹、木等产量不大，出口也不多，因此大批人口出外谋生，南洋、漳厦、潮汕、汀州、瑞金、大庾、南昌、赣州、南雄、汉口、广州等处岩侨数达几万人。因为龙岩地处漳厦与汀州、赣南交通中枢，货物运转频繁，一般农民除耕田外，很多兼做搬运工人。满清末叶，由于帝国主义洋货倾销及交通改道，烟、纸、茶滞销，搬运业亦逐渐衰落，因此手工业工人和农民破产日多。从光绪末年起，土地便日益集中，龙岩地主虽然不大，但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的过程却非常急剧，其中很大部分是祠堂庙宇的地产，而这些地产又主要掌握在土豪劣绅手里。我记得当我幼年时，自耕农还占多数，但到我长大时则雇贫农大批出现。由于地少人多，土地集中，随之的地租高利贷和贱买贵卖的商业资本剥削也日益加重。龙岩比较大的地主多兼营商业，而境内外商业资本家所获利润又多在乡间买田置业，从事封建剥削，很少转入工业生产。地主与商业资本密切结合，统治着城乡，盘剥农民与手工业者，人民生活便日益困苦，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民反抗地主的自发斗争日益频繁。一九一

一年辛亥革命时在龙岩西山，出现了翁矮古等几百人攻城事件，便是农民自发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象征。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并未熄灭，接着便出现了“土匪”，因此地主阶级借口“防匪自卫”，自一九二三年以后便废除了历来由家族长推举的无薪俸无机关的社长制度，而在各区建立有常设机构的保卫团，加强对农民的统治与压迫。龙岩县政府则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本来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从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入闽以后，龙岩县长更由劣绅杜连茹一派蝉联充任。这一派劣绅是龙岩封建势力的当权派，他们有一个全县规模的组织，名称叫做“庚申俱乐部”，各区乡都有它的成员，他们与驻军勾结，公开包揽诉讼，包捐，包赌，派兵担，开烟馆，并包庇商人贩运劣币，操纵金融。一九二三年更强迫农民种鸦片烟，从中抽捐征税。这便是龙岩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的政治经济概况。

龙岩虽地处偏僻，但知识分子却不少，县城办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九中学）一所，各区有高小，各乡有初小，到漳厦、福州、京沪就学的也不少，还有几个人到日本、法国留学，因此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便先从知识分子中传播。一九一五年九中学生便发起反对袁世凯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的运动，由于当时九中校长魏梦云限制学生的反日运动，九中学生便掀起罢课学潮，随着学生中就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组织。五四运动后，许多新思潮和马列主义书籍进入龙岩，龙岩知识分子更进一步要求有革命组织。一九二一年春，我从江西回家，在白土桐冈小学任教员，便与同事们组织“奇山书社”，社员达二百多人，多是九中同学和各区乡小学教员。当时及以后几年中，书社购买很多新书，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文集，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新潮》、《新青年》和《向导周报》等，这对龙岩知识分子的革命思想起了启蒙作用。

一九二三年便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上出版“岩声报”。出版这个报纸，目的在于揭露旧社会黑暗，报道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潮，宣传社会主义。当时正当杜连茹勾结驻军赖世璜强迫农民种鸦片，引起各乡农民顽强反抗，因此《岩声报》创刊号便集中揭露这个肮脏黑幕，表扬农民的英勇斗争，并指出革命出路。一九二五年我又从江西回家，此时已是国民党改组后的第二年，厦门已经有国民党组织，我经厦门友人介绍加入国民党，并要我在龙岩发展党员。由于有“奇山书社”与“岩声报”基础，一个月之内很快发展到四十多人，并成立了秘密的县党部。

纵观大革命以前，龙岩人民的革命活动，虽然仅仅停留于青年知识分子阶层，但这些参加革命活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很大一部分成为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大革命以后，龙岩历次的农民革命运动，正是通过这些革命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而逐渐开展起来的。革命理论为群众所掌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便产生了伟大力量，从而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从龙岩这个局部情况来看，也证明马列主义这条真理的绝对正确性。

二、大革命时期龙岩的革命高潮

与四·一五“清党”

一九二六年秋，北路北伐军已打垮了吴佩孚主力，包围了武昌，何应钦的东路军才匆忙向福建进军。当时驻福建的北洋军阀周荫人所部在永定和梅县的松口战败后，便从漳厦沿闽西、闽北，向浙赣边溃退。龙岩是在十月间解放的。当北伐军第三师经过龙岩时，国民党县党部便在县城公开办公（当时主要的负责人有陈国华、陈树槐、倪天长等人），号召工人农民支援北伐军，打倒北洋军阀，肃清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绅。不久福建省政府便派

张旭高（当时是左派分子）为岩、平、宁监察专员，监察署设在龙岩城。张到任不久，即将原拥护曹琨当选总统的国会“猪仔议员”连贤基扣留，并游街示众，这对龙岩是一个振奋人心之举，但张旭高不敢进一步打倒当时最坏的劣绅兼县长杜连茹，这暴露了他的不彻底性。我当时从江西崇义写了一封信给他和龙岩县党部，提出要集中力量打倒杜连茹一派；为了孤立杜派，对郑笔山派可以采取不同态度。这封信在“清党”以后被杜连茹派所得，即作为通缉我的“罪证”。

龙岩共产党组织的建立是由陈庆隆、郭滴人几个同志开始的，他们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中入党的，他们随同北伐军入岩后，在岩设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福建汀漳道办事处岩、平、宁分处。龙岩党一开始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从事农民运动为主。当时一般农民还有许多迷信和顾虑，如埋怨自己命生坏、八字不好，顾虑农民心不齐，斗不过地主等。由于郭滴人同志深入群众，宣传通俗，与农民同甘共苦，深得农民拥护，农民觉悟逐渐提高，东肖、黄坊、西山、湖邦、铁石洋、大小池、内江山、东山等社的农会才相继组成。但由于当时秋收季节已过和其他原因，未实现减租减息，因此，农民除了废除一些苛捐杂税之外，未得到什么好处。城市工人组织了工会，在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间建立了共产党龙岩县支部，当时的党员除了陈、郭外，新入党的还有陈国华、陈品三、谢宝萱、陈柏生、陈昆照、罗怀盛等同志。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三月间由监察署和县党部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禁止纳妾等决议，这些议案是经过会议上和杜连茹及其派系分子激烈斗争后始得通过的。会议结束前，有人提出破除迷信的临时动议，并提出应该把“阎罗天子”付之

一炬，即时获得有左倾情绪的青年和学生代表们的热烈支持，一轰而起，直冲城隍庙，把在全县迷信群众中有“威信”的“阎罗天子”的塑象毁了。会议结束后，张旭高又亲自带队到白土“铁山庙”，把庙里的“阎罗王”搬下来烧掉。这一行动引起了许多农民不满。不久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反革命，龙岩反动势力以杜连茹为首，便勾结驻军营长黄月波、罗步月，并纠集城郊区流氓狗腿子，于四月十五日包围县党部，实行清党反共，当时有陈国华、魏武、倪天长等六个人被逮捕入狱。县城工会、各区区党部和农民协会都被解散，工、农会积极分子被罚款，我及郭滴人同志等十三人被通缉，张旭高则逃往漳厦，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全龙岩。

三、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特殊情况 与农运再起

从四·一五清党反革命后龙岩的白色恐怖一直延续到七、八月间，当时党的组织虽然还很幼弱，但仍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农村中继续活动。郭滴人同志被通缉后，避居在湖邦、西山、大小池一带，团结原农协积极分子组成秘密农会，抵抗各地反动派之抓人罚款，并准备夏收时实行减租。白土后田的农民协会则在陈品三、陈锦辉诸同志领导下继续坚持工作。由于前一时期农协未实行减租减息，农村中阶级对立一时还不大明显，所以当时反动势力只在城内作威作福，乡下反动势力只是原属杜派的土豪劣绅和少数地痞流氓在活动，而这些人十几年来在群众中是坏事做尽，早已声名狼藉，孤立无援。因此尽管城内极端反动，而乡间反动派却不敢为所欲为，加上我们秘密农会的活动，所以有不少地方仍在我们党秘密控制之下。有些地区，如西山、白土、董邦

等处，在夏收时仍然实现减租。城内工人运动开始陷于混乱，以后又逐渐恢复。

这时我在江西崇义和龙岩两地被通缉，在瑞金居留了一个多月，以后得到家乡来信，知道形势逐渐好转，便于七月初秘密回到家乡，当天晚上便有几个农民到我家来看我。他们都愤怒地对我诉说张旭高烧阎罗天子的不是，并说那天晚上张旭高逃跑时，他们如何到半路上去捉他等情况。我当时估计张旭高幼稚行为触怒了农民的迷信心理，不能怪农民反动，因此我在同情农民责备张旭高幼稚之后，顺便向他们宣传农民如何受土豪劣绅的剥削压迫，说我们的敌人并不是坐着的阎罗天子，而是站着的阎罗天子，是杜连茹等一批土豪劣绅，我们要解放，要过好日子，并不必去烧“坐着的阎罗天子”，而是要团结起来，打倒那些“站着的阎罗天子”。这些话深受农民欢迎，我看农民情绪好转，便趁机提议夏收减租，更得到农民赞同，当即在我家——邓厝组成农民协会，实行夏季减租：“硬租减一成”，“软租减二成”。这个消息迅速传到白土各村。郑邦、后田、郑邦山、湖洋寨等村农民都来找我去演讲。我离开江西时已失掉党的联系，回家后经过几天活动，便找到了龙岩党的关系。

当时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正从上杭来到龙岩，住在支部书记陈庆隆同志家里，他说上杭局面已起了变化，驻军司令蓝玉田因未得到蒋介石正式编制，心怀不满，并且餉项无着，需要与左派合作，因此上杭从四·一五清党反共后的反动局面已经改变，国民党县党部已恢复办公，县党部都掌握在上杭县党支部蓝为仁、蓝为龙诸同志手里。龙岩驻军罗步月是蓝玉田所部，因此罗明同志指示龙岩党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上杭向蓝玉田请愿，要求释放六个被捕同志，以转变龙岩政局。县支部得此指示后，立即通知我和谢宝萱同志及石粉岭一个农民代表马上出发。我便于七月

下旬带罗明介绍信前往上杭城，去找蓝为仁同志，经过他的介绍再去拜访蓝玉田，并在县党部重新成立大会上演说，以后又在上杭城街上散发传单，控诉杜连茹等反革命罪行。经过上杭党的协助，经过代表团上述活动，加上当时南昌起义，罗步月不久又要调防，因此蓝玉田便慨然允许电令罗步月释放龙岩政治犯。俟八月初，我们从上杭回到龙岩时，这六个同志便在岩城一千多工人游行欢呼声中安然出狱，至此龙岩的白色恐怖便已烟消云散，原来的通缉令也已无形取消。

八月以后龙岩政局又有新的变化，一是县党部恢复，一是驻军换防。四·一五清党反革命时，杜连茹组织一批流氓捣毁了县党部，但杜连茹并不是国民党员，他也不要什么县党部，因此龙岩国民党县党部一直被封闭着。到了七八月间福建省国民党省党部恢复，省党部委员中有一个詹调元，他是龙岩东方大地主，与杜连茹派有矛盾，因此他保荐了苏庆云为龙岩国民党部常务委员。苏是我的九中同学，当时是一个左派青年。他回来后即与我们党支部商量，要立即恢复县党部。这是一个新变化。当时龙岩党支部认为这种新情况可以利用，我们也需要乘此有利时机，利用国民党这块合法招牌，来发展农民运动，为将来进一步斗争打下群众基础。因此便支持苏庆云建议，重新恢复县党部，并派我为县党部秘书，郭滴人为组织委员，谢宝萱为宣传委员。这样龙岩县党部便于九月初在县城明伦堂开始办公。当县党部刚开始办公时，即听说叶挺、贺龙同志所率南昌起义队伍由长汀进到上杭城，因此即由苏庆云秘密赴上杭，拟向叶、贺商请派兵来岩。接着又闻叶、贺队伍已离开上杭，苏中途折回。苏回岩后，省委派了一个同志来，指示我们在龙岩组织暴动，以响应叶、贺的军事行动。这位同志还带来了几张有叶挺同志领衔的革命委员会的委任状。党支部召开会议研究了当时形势，认为驻军罗步月营和

黄月波营，派系不同，矛盾极深，而罗步月此时又企图利用县党部这一左派势力以自固。因为蓝玉田的关系，当时他和我们也比较接近。我们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矛盾，推动罗步月接受革命委员会的委任，并用突袭战术把黄营包围缴械；我们则同时发动各乡农民群众入城，打倒土豪劣绅，摧毁以县长杜连茹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会议结束后，我和陈庆隆、苏庆云等同志深夜至罗营，向罗说明我们与蓝玉田的关系，说明南昌起义，叶、贺南下闽、粤，革命高潮就要到来的新形势，结果他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委任状，同意了我们的暴动计划，决定在第三天行事。次早，同志们便分头下乡组织农民队伍。但是，黄月波侦知有异，在我们起事的前夕，突然宣布全城戒严，罗步月因而不敢动手，党支部迫于形势只得取消暴动计划，星夜通知各乡农民协会，不要率领群众入城。内江山得通知迟，队伍已经开到了龙门圩附近，他们的革命热情高涨，要继续前进，后来郭滴人同志及时赶到，说服了群众，才返回内江山去。

这回暴动计划没有实现，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进行反噬，原因是由于当时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反动派军队激战于潮汕地区，胜负未分，局势未定；黄、罗二营势均力敌，黄月波不敢发动一场没有胜利把握的战争；农民群众的力量虽然才初步组成，但已声势夺人，杜连茹等不无顾忌。所以也只好装聋作哑，求得一个暂时相持的局面。不久，罗、黄他调，闽南著匪陈国辉率部入岩接防，杜即向陈国辉告密，要陈以“通共”为名逮捕苏庆云等。幸陈国辉初到，又查无实据，不敢动手，因此县党部仍然按原计划在城内公开办公。龙岩的农民运动便从此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这个时期正是接近秋收，陈国辉到岩后又修筑岩永和岩漳公路，要各区、乡派公路捐，派民工修路，因此，我们这个时期领

导农运的斗争目标主要是实行减租、减息，以后又转到公路捐的合理负担。当时的减租成数一般是减二成，也有减三成、二成五的；公路捐我们不公开反对，而提合理摊派，是为了避免与陈国辉正面冲突。所谓合理摊派主要是改变历来按户口摊派为按田亩摊派，把负担加到地主、富农和公尝财产身上，从而减轻雇贫中农的负担。过去县里派捐款，派兵担，各乡家长总是加倍征收，额外中饱近囊，现在在农民协会监督下按田亩摊派，摊到他们头上，因此他们不仅不敢多派，而且向县里求减。所以这个合理负担是取得广大群众拥护的斗争。当时我与郭滴人同志等主要做农会工作，同时兼顾工会工作。郭滴人同志经常先去布置秘密农会，我则在农会召开成立大会时出席演讲。当时演讲内容主要是指出劳动创造世界，工人、农民是社会主人的真理，并列举当前事实，说明十个农民九个穷，不是命生坏，运气不好，风水不好，而是受地主、资本家和土豪劣绅、军阀官僚的剥削所致。说明陈国辉初来为什么就这样厉害地剥削压迫农民，主要是由于本地土豪劣绅做他的帮凶内应。指出农民要减轻剥削与压迫，以至取得最后解放，必须依靠自己的团结与组织，依靠自己的阶级力量。这个时期农运发展较好的有东肖、湖邦、黄坊、西山、平在坊、铁石洋、内江山、大小池、东山社等。在减租斗争中产生了一批农会骨干人物，如东肖之陈锦辉、陈品三、张双铭、邓潮海、张洪照、张锦添，董邦之张涌水、张载荣，石粉岭之倪荣照，小池之陈寄今、邓海泉，铜钵之廖秀芳，铁石洋之×××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和农民暴动的领导者。

这个时期农民运动发展有几个特点：首先，农民协会是在与农民有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农民参加农会组织是为了减租减息，而不是为组织而组织，这与大革命时期的农会组成了几个月，农民还未得到什么好处，有很大不同。

其次，当时不少农会是以秘密农会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农会是由工作同志在农民中先找到贫苦的有觉悟的积极可靠的人扎下根子，以后再由他们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积极分子。开始积极分子往往只有一两个人，以后逐步发展到几十几百人，这样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秘密到公开，这是当时最好的农会组织。这样的农会一开始就形成了可靠的领导核心，组织了阶级队伍，建立起民主制度，走群众路线，从发展会员，编小组，选举组长、委员，规定斗争纲领，斗争布置等都经过会员民主讨论，多数表决，领导人与群众联系密切，信仰很好，会员觉悟也较高，不仅爱护干部，而且也敢于批评干部与监督干部，从而避免干部的特殊化。因此这种农会发展一步就巩固一步，以后无须重新改组，也经得起风雨袭击，差不多一劳永逸。所以这样的农会在开始建立组织时虽然慢一些，时间长一些，但以后进展很快，从农会发展整个过程来看，还是速度最快最合算的。

第三，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农会是经过国民党区党部公开号召，会员报名入会，组织起来的，农会组织一开始就全面铺开，未经过个别串连，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过程。这种一下子轰起来的农会，在建成时间上虽比较短，发展很快，但由于未形成领导核心，领导人信仰不高，与群众联系不深，有的甚至为投机分子所把持。因此，这种农会往往徒具形式，经过多次改组，花的时间很长，真是欲速反慢。有些农会虽然经过整顿，还是组织涣散，不起作用，经不起斗争考验，更经不起风雨袭击，以后白色恐怖一来，多数自行瓦解。

第四，关于农会领导成分问题，当时虽然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农村阶级分析，知道农民是革命的主力，但对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了解不够，因此对依靠雇贫农、树立雇贫农的领导核心未加注意，以致当时许多农会的领导成分中农占优势，并混进不少佃

富农。这些中、富农在和平合法的减租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革命转到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时他们就动摇消极，这是当时农运的最大缺点。

尽管当时农运有上述缺点，但由于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所以农民协会发展很快，从九月至十一月不到三个月时间，全县除了溪口、雁石、白沙、内外山前等区外，其余各区乡及城郊都已组成了农民协会，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禁烟禁赌，参加农协会员近十万人。这是龙岩农民运动的新高潮。正由于农运开展，农民中对陈国辉及其走狗林树宏（公路局长）、林尚轩（营长）、郑菊人等异常愤恨，因此陈国辉及一般土豪劣绅派马路工、马路捐不能那样为所欲为。同时陈国辉与杜连茹等封建势力已密切勾结，陈国辉又升了旅长，于是陈国辉在就职旅长宴席上便公开声言：“近闻有些青年在农民中骂我，破坏派马路工，我警告他们不要再这样干，否则我陈某不是好惹的。”陈说话时杀气腾腾，说明龙岩不久又要来一次白色恐怖。但当时我们估计有十万农民为后盾，我们又不公开反对陈国辉，陈国辉不敢马上动手，同时农运进一步开展，也还需要再利用一下这种公开合法机会，因此我们除提高警惕外，仍然保持着“你说你的，我干我的”的态度，硬着头皮在城内顶下去，并不示弱。

这个时期省委指示，要我们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大胆吸收农民入党，改变过去党长期停留于知识分子的状态。因此我们便在秘密农会中公开宣传土地革命，并坚决吸收农民党员。我记得当时大家对发展农民党员没有经验，不知如何说话，过了好久，一个农民党员都没有找到，后来还是后田陈品三同志介绍了陈锦辉同志入党，这是龙岩第一个农民党员。有了这个经验，各地就先后跟上了。从此，龙岩党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从原来的知识分子包办的党，改变到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这是龙

岩斗争由减租减息的和平合法斗争转到以后的武装斗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关键。

到了十一月间，龙岩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从南昌起义后分化出去的蒋（光鼐）、蔡（廷锴）部队此时从福州南下漳厦，他们标榜着“肃清闽南土匪”的口号，实际是取道闽西入粤。我们不了解他们的内幕，认为蒋、蔡入岩对陈国辉是一个打击，因此当他们经过适中时，党支部决定我以国民党县党部代表名义，秘密前往适中欢迎蒋、蔡，并接洽解决陈国辉部队事宜。谁知他们一到适中便向永定前进，并不到龙岩城，经过几次商量只允许派一个营到龙岩城。就在蒋、蔡到适中那一天，陈国辉部队便慌忙撤退漳平，此时岩城空虚，四五千群众在城内集中准备欢迎蒋、蔡部队，时已过午，蒋、蔡未到，群众等得不耐烦，郭滴人同志便在人群中煽动，他高声问道：“这几个月弄得我们大家如此困苦，这是谁害我们？”群众齐声答复，“是土匪军阀陈国辉。”郭同志又问，“陈国辉是外来人，为什么对我们内部情形这样清楚？”群众齐声说：“由于有林尚轩、林树宏等走狗作内应！”郭又问：“今天我们对这些走狗该怎么办？”群众说：“到他家里去抓他！”这样，几千人就在郭滴人等同志率领下，首先向武安坊林尚轩家里汹涌前进。林当时已随陈国辉撤退漳平，群众便在家林家中尽情捣毁，林的叔父林周臣（也是大劣绅）有病在家，就被群众威力吓死了。随后群众又涌向东门，刚到南门遇见另一走狗王梓兰，群众向前逮捕，王梓兰开枪逃脱，群情更加愤激，便到东门外烧王梓兰、林树宏等人的房子，这就是龙岩城暴动。第二天蒋、蔡派一营人进驻岩城，我们召开了一个三万多人的群众大会，以表欢迎。他们住了两天即开走，陈国辉部队又倒回龙岩城，并派便衣队先行入城，我们便于黄昏以前分头撤出岩城，转入乡间活动，从此龙岩又一次遭受了比以前更严重的白色恐怖。

总结这个时期，在短短的三个月中，我们利用公开合法机会，广泛发动了群众，组织了十万农民，实行了减租减息，扩大了党的影响，揭露了阶级剥削，提高了农民觉悟，发展了积极分子，加强了党的组织，这样就为下一阶段实行武装暴动，土地革命准备了群众基础。可以说这个时期党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但由于我们当时在农运中未能树立雇贫农优势，不少农会领导权掌握在中富农手里，土地革命的口号，仅仅只在秘密农会中开始宣传，当时党中央八七紧急会议决议尚未传达，实行红色割据的方针也不明确，因此，我们没有也不可能在陈国辉部队撤离龙岩，或者以后他回来实行白色恐怖的时候，适时在农村举行武装暴动，收缴反动武装，捕杀反动派，实现土地革命，摧毁陈国辉的统治基础，以致坐失时机，让陈国辉的白色恐怖再一次笼罩龙岩。这是当时龙岩党工作的最大损失。

四、白土斗争与后田暴动

白土（东肖区）从大革命时期就有了党的组织，有了农民运动，但农民同样没有得到实际利益，经过张旭高火烧阎罗天子，在部分农民中又引起了反感。夏收时后田、郑邦、邓厝、孟头等处实行了减租，但大乡村如溪兜、龙聚坊、菜园厝等还没有工作。到十月秋收时，经过区农民代表大会议租后，减租才较普遍地进行，以后经过后田、郑邦和孟头的秘密农会串连，才在溪兜、龙聚坊、榴坑、肖坑、东坑、西坑、连圣、曲潭、田洋等乡发展工作。第二次白色恐怖时，其他区乡农协都被解散或自行瓦解，许多农会积极分子被捕罚款，或逃亡他乡，只有白土农会仍然存在，陈国辉也不敢到白土来抓人。白土农民又以拖的方式，

实行了抗捐、抗税、抗粮。后田、郑邦、榴坑、龙聚坊、邓厝、孟头等乡农民，在减租胜利后又进一步向家长算公尝账，揭发家长贪污公款，并要他交出存款。过去祠堂祭祖时供祭之猪、羊、果品等，大部分按绅士功名分配，分到农民手里寥寥无几，这个时候则根据农会提议，按现到人丁分配，这种斗争虽属小节，但对绅士家长的威风却起了很大的打击作用。

此时龙岩党支部改组为县委，书记是罗怀盛同志，郭滴人同志为组织部长，我为宣传部长，陈品三为军事部长，县委机关住在后田。省委派陈祖康来传达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布置武装暴动。由于陈祖康在永定之坎市、大排一带土匪中有一些工作，他便主张调动坎市和大排土匪配合白土农民进攻龙岩城，这是一个完全军事投机的盲动冒险计划。县委同志认为这样不仅不能攻进城，即使侥幸入城，而让土匪大肆抢劫，更要丧失人心，脱离群众，因此，大家都不赞成，陈祖康却坚持己见，最后由于坎市大排土匪调不动，才打消此计划。陈祖康也从此离开龙岩。

一九二八年过了春节，粮食涨价，后田农会决定禁粮出口，平定粮价，这对雇贫农有利，但对地主富农极为不利，因此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后田地主企图压服农会，便雇用一批流氓、地痞、拳术师和个别落后农民组织拳术馆，与农民协会的拳术馆对抗。到了阴历二月十三那天，地主进一步阴谋破坏农会，要他的走狗陈北瑞暗杀我农会负责人，后田支部便决定那天晚上先打死陈北瑞，乘机暴动。此决定得到县委批准，并通知郑邦、龙聚坊、邓厝、孟头等支部一致行动。那天晚上黄昏后不久，陈北瑞刚从地主大楼出来，便被农会负责人陈锦辉同志一枪打死。枪响后，后田反动地主都溜走了，后田农会便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地主阴谋与陈北瑞的反动行为，并当场通过要后田地主将所有田契、借约、枪枝都缴来农会，当时收到枪枝十几支，田契借约当场